



清代外務部 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 ——中英關係卷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北京大學 澳大利亞拉籌伯大學 編 •

第一冊 • 路礦實業

BRITANNIC
MAJESTY'S
LEGATION
IN
CHINA

中華書局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北京大學 編

澳大利亞拉籌伯大學

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中英關係卷

第一冊·路礦實業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 中英關係卷. 第1冊, 路
礦實業/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北京大學, 澳大利亞拉籌伯大學
編. —北京: 中華書局, 2006
ISBN 7-101-04889-7

I. 清… II. ①中…②北…③澳… III. ①中外關係-國際
關係史-檔案資料-中國-清代②中英關係-國際關係史-檔
案資料 IV. D82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117514 號

責任編輯: 王 勉

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
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
——中英關係卷

第一冊·路礦實業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北 京 大 學 編
澳大利亞拉籌伯大學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89×1194 毫米 1/16·42 $\frac{3}{4}$ 印張·4 插頁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0 冊 定價: 420.00 元

ISBN 7-101-04889-7/K·2113

編委會名單

主 任：Michael Osborne 郝 平 吳志攀 邢永福

副主任：鄒愛蓮 李岩松 裴麗昆 金 莉

委 員：Alan Frost 徐 凱 張西平 胡忠良

唐益年 呂小鮮 屈春海

執行主編：Michael Osborne 郝 平 徐 凱 胡忠良

副主編：Alan Frost 裴麗昆 呂小鮮 屈春海

編 輯：王 玲 潘俊英

數字編輯：李 靜 葉 斌

參加工作人員：沈 原 劉赫芳 張敏 張靜雯 張寧華 郭 慧 徐春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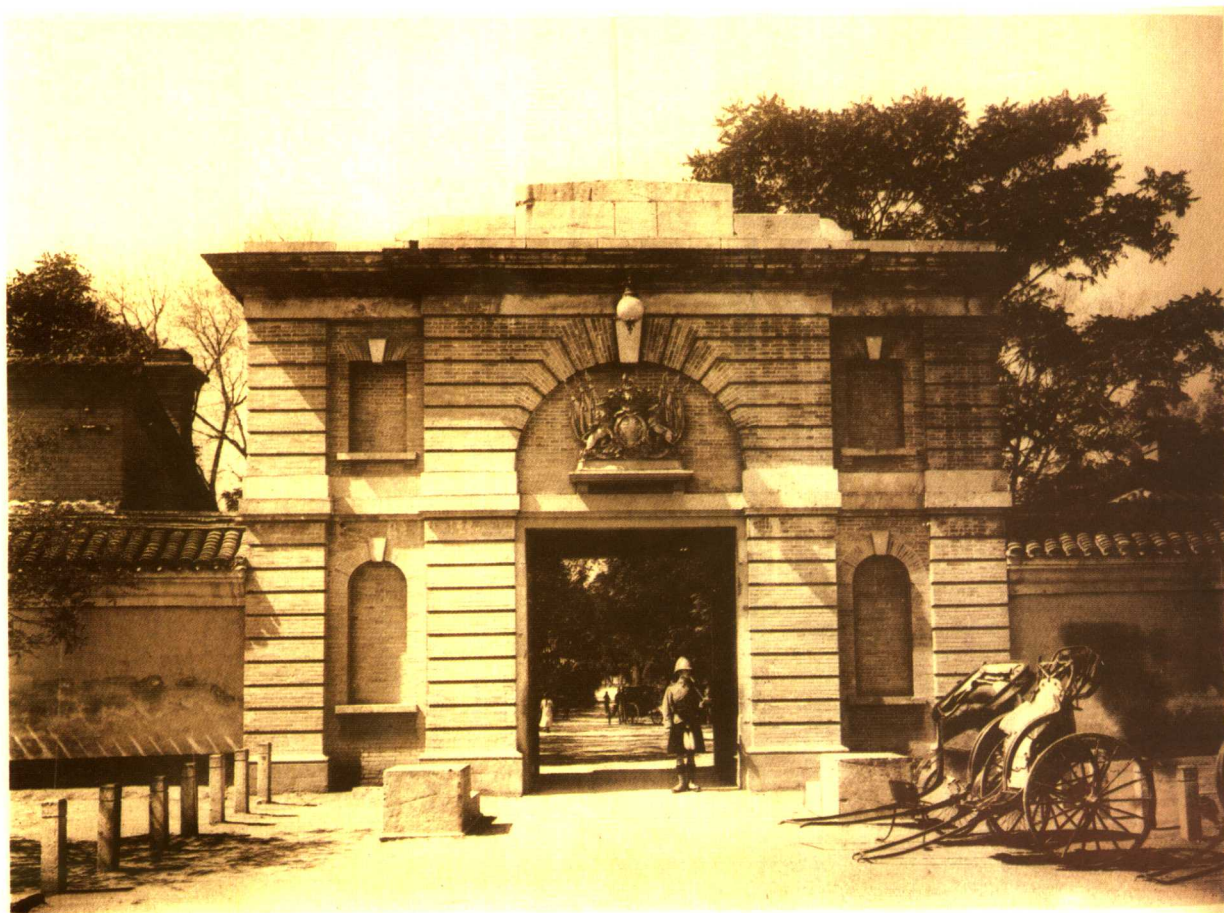
攝 影：霍 華



1. 清代全圖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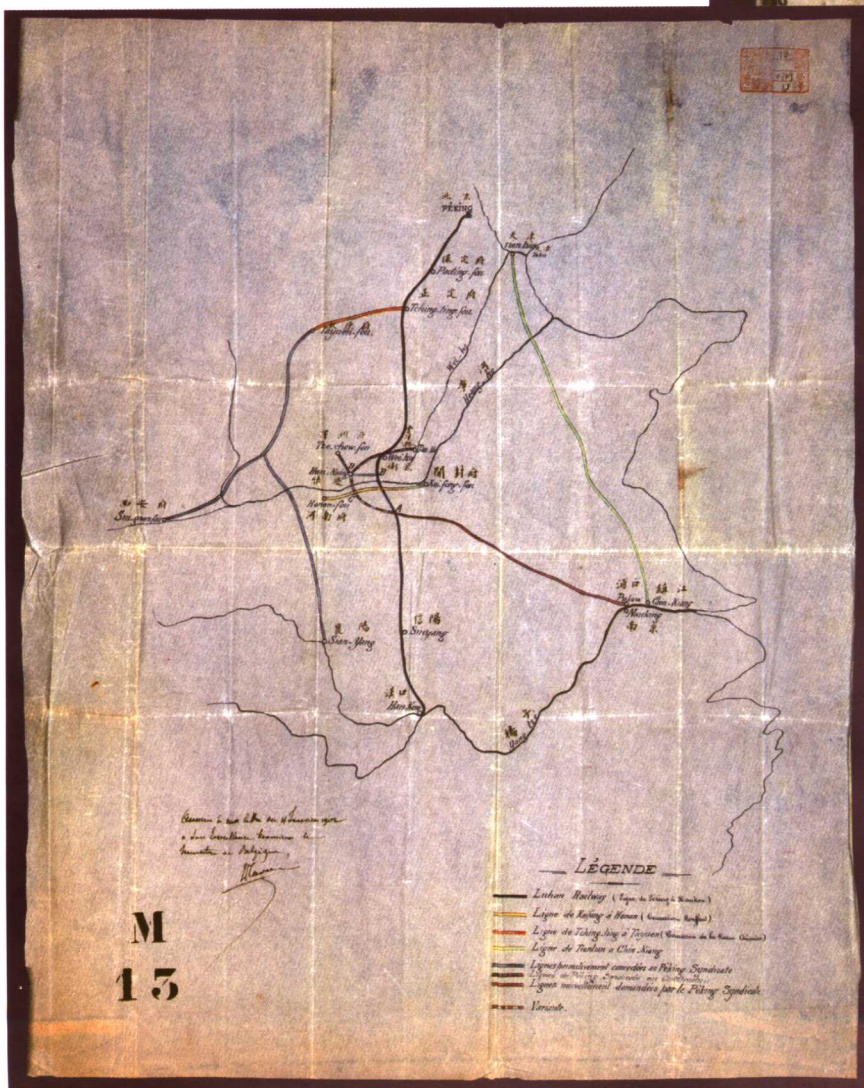
1. Map of the Qing Empire(1820)



2. 英國駐華公使館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

2. Building of the British Legation in China(1908)



3. 懷浦鐵路圖暨外務部收文單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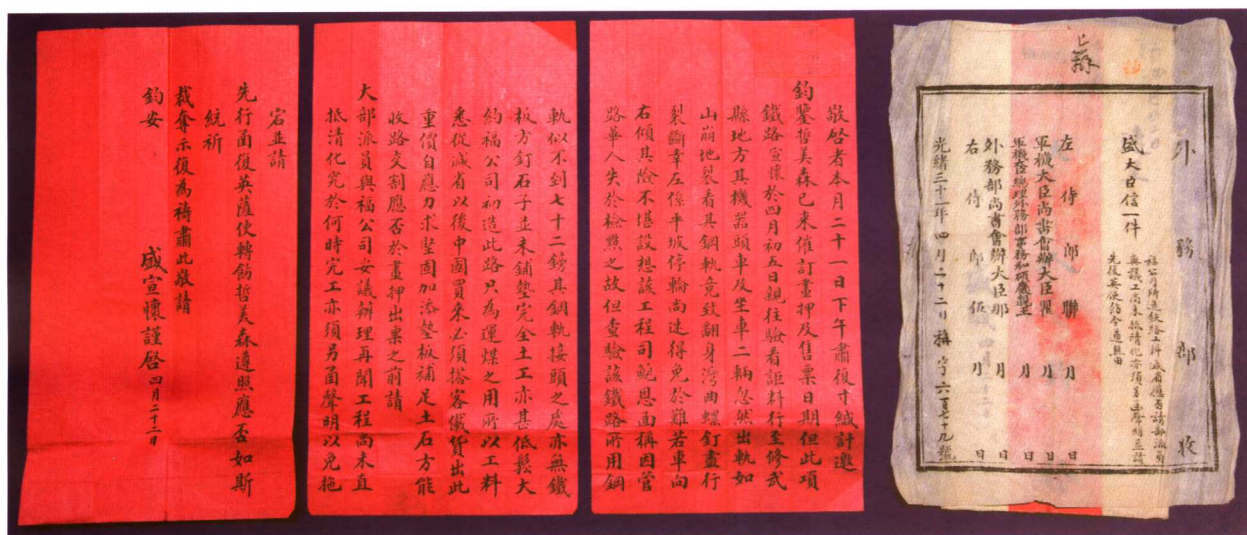
3. Huai-Pu Route Map and the note of acknowledgement from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1902)



4. 外務部為由中國自籌津保鐵路款項事致英國駐華公使薩道義照會稿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二十日（1902年10月2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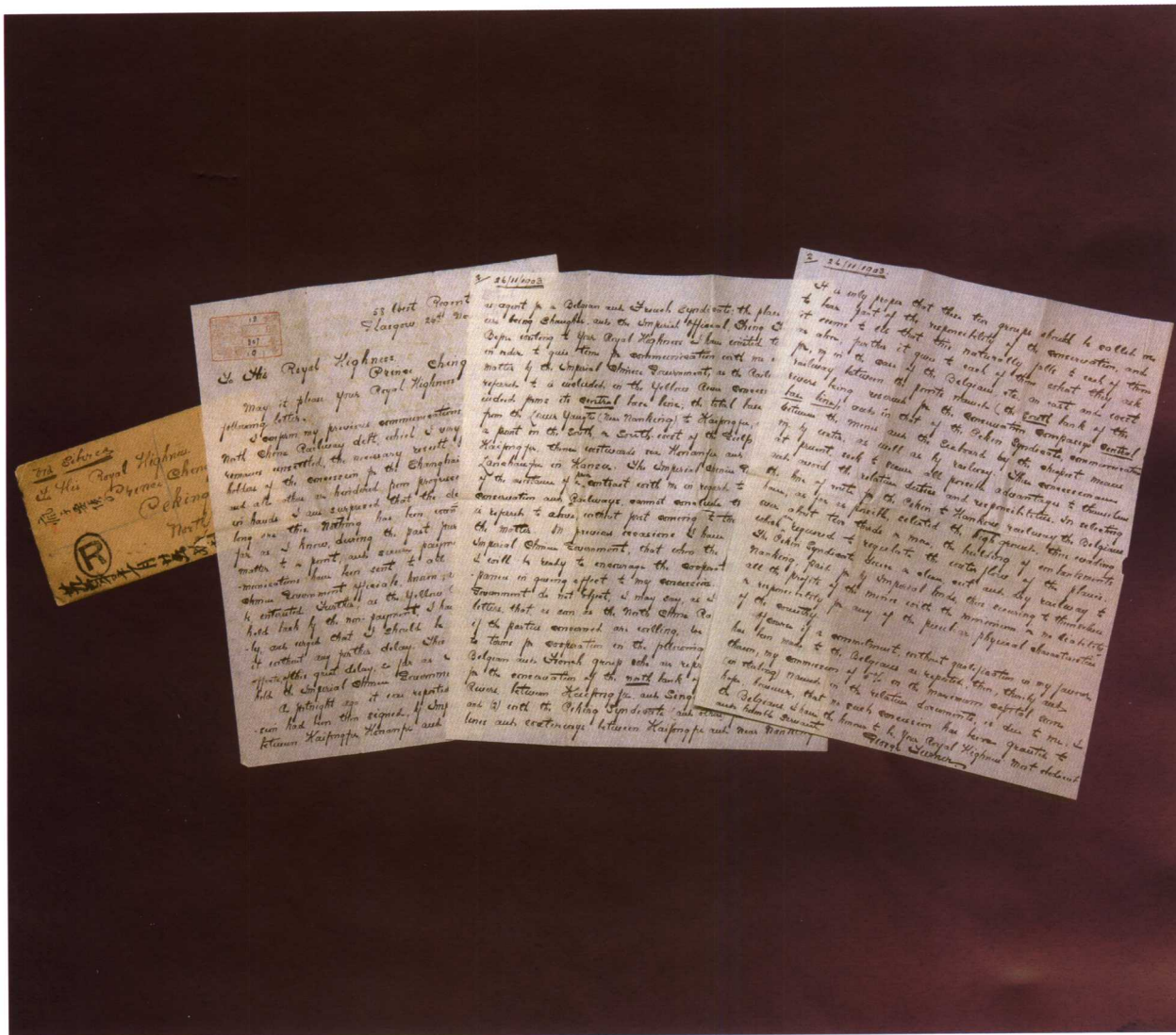
4. Draft of diplomatic not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Jin-Bao Railway Line which is to be supported by Chinese self-funding, from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o Sir Ernest Satow, British Minister in Peking (21 October 1902)



5. 鐵路大臣盛宣懷為英國福公司所造鐵路偷工減料請派員妥議事致外務部信函

光緒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1905年5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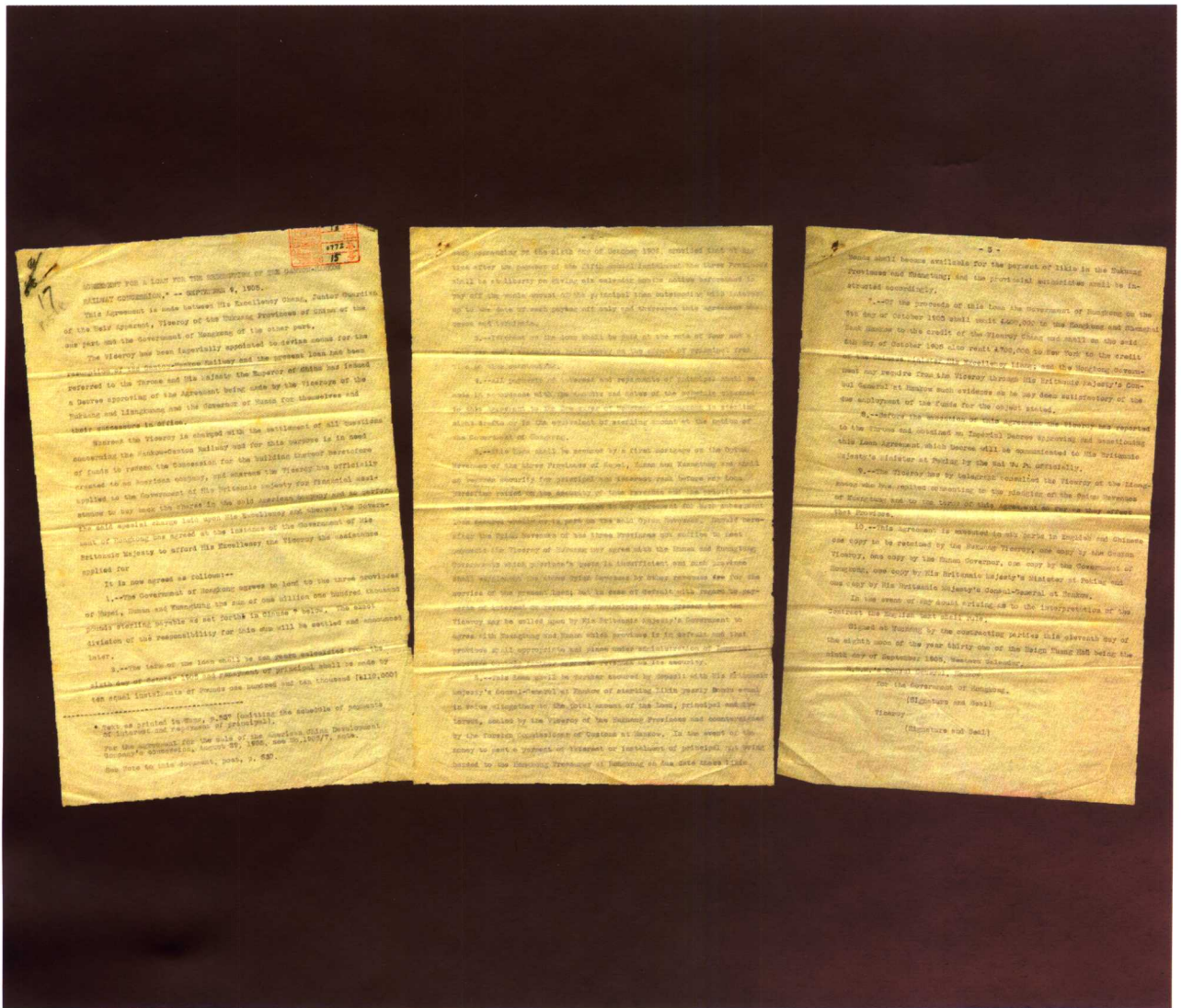
5. Letter requesting investig into the quality of the railways built by the Pekin Syndicate from Sheng Xuanhuai, Director General of Railways to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5 May 1905)



6. 英國商人德訥爾為索還華北鐵路借款事致外務部慶親王奕劻英文信函

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初八日（1903年11月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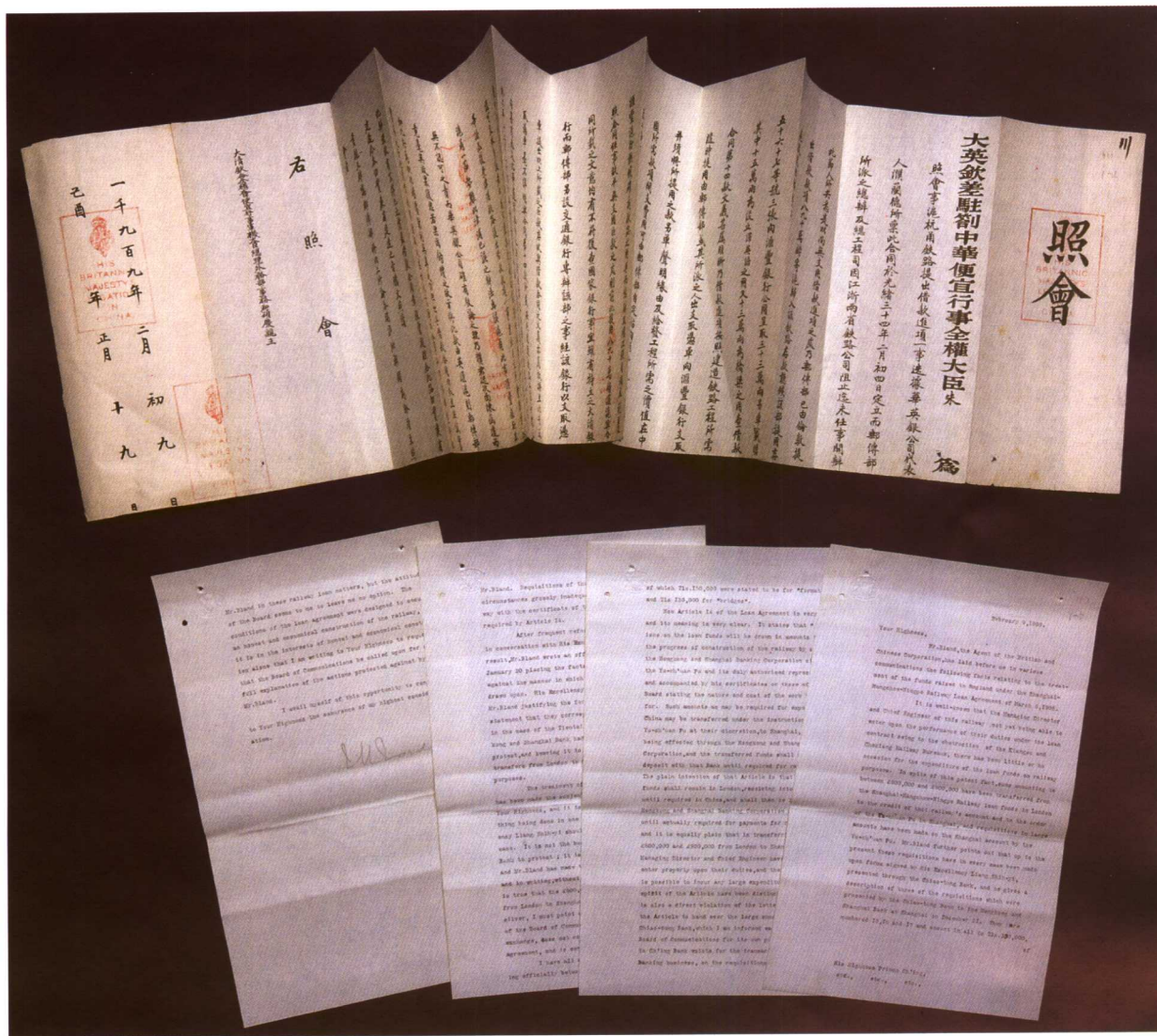
- Letter in English to Prince Qing,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from Mr. George Turner, a Glasgow businessman, concerning repayment of the debt for building railways in North China (26 November, 1903)



7. 英國駐漢口總領事法磊斯與湖廣總督商訂粵漢鐵路借款英文合同

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十一日（1905年9月9日）

7. The loan contract for the Yue-Han railway line in English, signed by Zhang Zhi-Dong, Governor-General of Hu-bei and Hu-nan provinces and Evarard D.H. Fraser, British Consul-general to Hankou (9 September, 1905)



8. 英國駐華公使朱邇典為滬杭甬鐵路借款事致外務部中英文照會

宣統元年正月十九日（1909年2月9日）

8. Diplomatic note in English on the loans for the Hu-Hang-Yong Railway, from Sir John Jordan,

British Minister in Peking, to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9 February 1909)

蘇省鐵路原字

敬字者富賦通奉

鈞創開路政司崇呈據蘇路公司呈稱蘇省鐵路自滬站之復
軍營起至華莊為第一段自華莊至松江為第二段自松
江至斜塘為第三段自斜塘至楓涇為第四段計全線長
一百十二里現在工程告竣所有滬嘉全路辦理情形咨請
派員驗收等情前來查滬嘉全路該段工程告竣自應派
員驗收以昭核實該查有奉部飭同官京張鐵路總工
程司長詹天佑為督同富爾德驗收蘇省滬嘉路工程情形事致郵傳部稟文（局部）

石且堪禦水冲刷既通凡遇此等緊要工程外人所注意者
無不踴躍停車督令富爾德眼同履勘詳細研究均屬料
實工堅建築悉合法度渠六極稱妥其驗收既畢毫無異
議現該全路已先於四月十日舉行開車禮每日客貨重車
往返六次每點鐘約行九十或一百華里不等余謂道平橋
穩利便交通若吾華商辦多路惟此一線之外款外人
乃第一次完全告厥其徵在事者經營締造彈謁精力
也堪慰

憲除將各項工程情形另具清單分晰開呈外所有遵札督
同施杭甬總工程司富爾德驗收蘇省滬嘉路工程緣由理合稟
稟

憲台鑒核再職道刻已造返漢鎮乃因川路盼切開工函電迭
催就便暫往擬蓋字派即迂道馳赴宜昌布置數日仍
行回京銷差不敢久延合併陳明肅此具稟恭啟

勛安伏維

詹天佑謹啟

9. 詹天佑為督同富爾德驗收蘇省滬嘉路工程情形事致郵傳部稟文（局部）

宣統元年六月十七日（1909年8月2日）

9. A part of the report by Zhan Tianyou on the audit of the quality of the projects along the Hu-Jia line in Jiangsu Province carried out by Mr. Foord, Chief Engineer of the Hu-Hang-Yong project

前言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大學和澳大利亞拉籌伯大學的合作成果《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中英關係卷·路礦實業》出版了。這是一份研究中國近代史、中外關係史的十分寶貴的歷史文獻。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現存明清檔案文獻一千多萬件，其中不少涉及到中外關係史的檔案主要集中在總理衙門暨外務部全宗中。清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置於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年），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改稱外務部。現存的中英關係檔案共五四二卷，一萬一千餘件。時間為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至宣統三年（一九一二年），是晚清外務部與英國政府及駐華機構外交活動的真實記錄。從公文形式上看，主要有條約、照會、信函、咨文、電報等。文字上以漢文為主，另外還有百分之十五左右為英文及其它文字。

有關清代中外關係檔案史料的編輯出版工作，早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前身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時期就開始，如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八年相繼出版《清季外交史料》、《清季教案史料》等。近年來也合作編輯出版過《清代外務部中奧關係檔案精選》等，但將清代外務部檔案中英關係檔案史料編輯出版，這還是第一次。

本書為《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中英關係卷》的第一冊，所選內容集中在路礦實業。按照計劃，我們還將陸續編輯出版中英關係其它專題的檔案。本卷所選檔案（主件、附件）三十一件，全部以原件影印出版，供專家學者研究參考。為使這些檔案脈絡清晰，編者按專題分類，每類下按檔案形成時間順序編排。同時，編者依據檔案內容逐件擬定標題，編製目錄，並注明中西曆對照時間，以便讀者檢索。

編者

二〇〇六年一月

一八四二——一九一一年中國與外國列強的交往與紛爭

Alan Frost Michael Osborne 裴麗昆

一八四二至一九一一年在中國歷史上祇是短暫的一瞬。然而，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被捲入了日益擴大的全球政治和經濟體系之中。中國被迫以其前所未有的方式與外界接觸，隨之而來的是主權和自信的喪失。

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英國發動了鴉片戰爭，倚仗其海軍優勢打開了中國的門戶，廣泛地進入了中國市場。在此之前，中國一直堅信其傳統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優越性，視周邊國家為藩屬小國，對外始終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與西方的通商也僅限於廣東沿海的幾個嚴格控制的口岸，鄙視外國貨物，並堅持西方商人以白銀支付所購絲綢、瓷器和茶的貨款。中國對外的傳統立場通過年邁的乾隆皇帝對英國外交官喬治·馬戛爾尼公爵的態度清楚地體現出來。一七九二年英國政府派馬戛爾尼與中國商討開放更多的北方口岸和更優惠的通商條件。馬戛爾尼認為他是來自於一個與中國同樣偉大的國家——英國的使者，因此拒絕向乾隆皇帝磕頭。他的這一行為被中國官員視為野蠻無理之舉。當他獻上所帶禮品和貨物時，乾隆皇帝說：「我對珍奇異寶不感興趣。你們使節應該明白我們擁有一切。我不認為這些奇技淫巧的東西有什麼價值，我也不用你們國家生產的產品。」^[1]

為了每年用鴉片獲取大量的金銀，英國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對中國發動了鴉片戰爭。戰爭給他們帶來預期的成果。隨着一八四二年八月《南京條約》的簽訂，中國對英國開放了廣東沿海，以及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的口岸，同時還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在這些口岸及其附近地區還被英國劃出租界，設定領事，執行英國法律，並負責與當地官方交涉，以之作為貿易基地，建立了商務與金融機構（其中最重要的是怡和洋行）。其它國家也開始倣效，與中國商討類似的合約^[2]。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英關於租界問題不斷產生紛爭。中國不希望外國人接近，也未將英國視為是一個與之有着平等地位的國家，

[1] Michael Greenberg: 《英國貿易與中國的開放，一八〇〇——一八四二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劍橋，一九五一年，第四頁，Joanna Waley-Cohen: 《十八世紀後期的中國與西方技術》，《美國歷史回顧》，第九八卷，一九九三年，第二五二—二五四頁。

[2] T.F.Tsiang: 《南京條約締結後商業特權在其它國家的擴展》，《中國社會學與政治學回顧》，第一五卷，一九三一年，第四二二—四四四頁。

而英國却希望不斷擴大它在中國的租界。從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〇年，當時在印度支那的英法聯軍占領了廣東和其它一些城市，一八六〇年《北京條約》簽訂，中國政府被迫接受外國大使進駐北京，允許外國人（包括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並繼續鴉片貿易。中國還被要求建立總理衙門，以總理各國事務^{〔三〕}。其結果是條約港口急劇增加。一八六〇至一八六四年間又增設了九個通商口岸，並重建了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由羅伯特·赫德男爵主持總稅務司，海關大部分高級工作人員均為英國人。除了徵收稅賦以外，關稅服務中心「完成了中國海岸綫製圖、安裝航海設備、建立郵政系統、學校和大學、發表商貿分析和外派海外留學生等工作」^{〔四〕}。一八六四年，匯豐銀行成立，該銀行後來成為英國的投資渠道。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英國每年出口到中國的貨物達八百萬英鎊，控制了中國約百分之八十的對外貿易。

英國在竭力確保「最惠國」待遇的同時，還要求中國對所有國家都同等開放。其它列強如德國、法國、美國和俄國的國民也爭先恐後地來分一杯羹。他們或是居住在英租界內，或是居住在他們本國政府協商後獲得的租界裏。至一八七八年，約有三千八百名外國人居住在通商口岸（其中約一千九百五十名是英國人），在中國的外資公司達三百五十一家（二百二十家為英國公司）。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間，列強還同時鼓勵本國的公司在中國的發展項目投資，這一時期相繼成立了德華銀行（一八八九）、華俄道勝銀行（一八九五），一八九八年法國東方匯理銀行也移到了中國。

中國與洋人的摩擦依舊不斷，西方傳教士的活動也是造成緊張關係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中國的羅馬天主教傳教士人數從一八七〇年的二百五十名增至一九〇〇年的八百八十六名，各種新教徒從一八六四年的一百八十九名增至一九〇五年的三千四百四十五名。當這些傳教士散播某種思想的時候，他們往往帶着偏見。這些傳教士堅持西方價值觀，尤其認為基督教具有優越性。因此，當他們的活動在衛生或教育的某些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時，很容易產生蔑視和偏見，從而與地方德高望重的中國鄉紳產生矛盾。傳教士不斷製造摩擦，領事們不得不逐個進行調停。隨着事態的不斷惡化，對傳教士廣泛的積怨最終導致了一九〇〇年強烈敵對洋人的義和團運動的爆發。

〔三〕 總理衙門於一九〇一年由外務部取代。為簡便起見，本書英文均使用「外務部」（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四〕 L.K.Young,《英國在華政策，一八九五——一九〇二年》，Clarendon 出版社，牛津，一九七〇年，第六頁。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歐洲列強紛紛效倣英國全球戰略的先例，在美洲、非洲、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展開了激烈的領土和經濟特權的爭奪^{〔五〕}。在中國，俄國和日本，甚至更遙遠的美國也加入到爭奪戰之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爲了爭奪對朝鮮的統治權，

日本海軍在甲午戰爭中擊敗中國海軍，日本軍隊開始在中國大陸登陸。日本的軍事勝利爲其它列強要求更多的租界提供了範例。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國強占膠州灣，四個月後，德國獲得該港口和鄰近地區九十九年的租借合同，以及採礦和鐵路特權。已開始修建的泛西伯利亞鐵路爲他們提供了向東擴展除水路以外的另外一條可行的路線。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俄國占領了滿洲遼東半島最南端的不凍港旅順港，然後攫得了二十五年的租借權。一八九八年四月，法國獲得廣州灣九十九年的租借權，六月，英國獲得與香港毗鄰的新界九十九年的租借權，七月，爲了建立與俄國旅順港對抗的港口，英國獲得威海衛附近劉公島和附近十海里海岸的租借權。

在這場利益爭奪戰中，英國企圖維持「門戶開放政策」，即每一個國家在其領地內享有特權，而不僅僅是「勢力範圍」和貿易「平等」。正如英國內閣大臣一八九七年十二月所述：

「我們可能會同意俄國分享貸款利益，但前提是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我們各自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從中國取得我們所需要的。俄國在陸地上，我們在海上，可以完全控制中國，並抵制任何其它國家的介入。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因爲至今我們是沿着相反的方向行動。但考慮到德國的態度，現在向一個新的方向發展時機是否已經成熟？」^{〔六〕}

在這場爭論中，造成衝突的聯盟迅速地興衰。法俄於一八九四年爲了共同利益結成同盟，引起了日本的警覺。爲了對抗這一聯盟，英國和日本於一九〇二年一月結成同盟。德國則脫離衆多合作伙伴單獨行動。美國力爭保持「門戶開放政策」，並密切注意各國動向。這場角逐如此激烈，列強分割中國似乎已毋庸置疑。這一狀況隨着義和團的興起而更加激化，最終導致了一九〇四年二月的日俄戰爭。

在外交斡旋和武力衝突的同時，列強在中國的爭奪還更多地體現在經濟投資領域。中國多次被迫接受巨額貸款，爲償還貸款，中國必須以海關關稅和其它費用，如地稅和礦區使用費等資源作抵押。

〔五〕 關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主要的帝國競爭參閱 Young，第二頁。

〔六〕 A.J.Balfour 的演講，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九日，Francie Bertie 閣下備忘錄，一九〇一年七月二日，Michael Hicks Beach 閣下給 Salisbury 的信，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引自 Young，第九十二、三百和五頁。

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起，俄國、法國和其它政府公開支持本國在中國的金融機構。換句話說，這些列強已將金融活動納入他們的國家政策中。而十九世紀下半葉的絕大部分時間裏，英國政府一直保持利益分割，拒絕通過銀行機構來擔保貸款和其它投資。一八九八年以後，儘管英國政府極不情願，但也不得不改變它的一貫立場，在英國市場上公開為貸款籌資。隨着英國逐漸將金融投入對中國的外交領域中，他們需要一個代理，因此英國外交部與匯豐銀行聯起手來^[7]。

中國與外界如此廣泛深入的聯係不可避免地對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起初為了扭轉對西方列強的弱勢局面，慈禧皇太后、一些保守的官員和知識分子採納了「自強」政策，中國購買了現代槍炮、蒸汽船等設備。正如一位官員所說：「我們從夷人那裏唯一可學之處是結實的船舶和有利的槍炮。」^[8]但是，隨着一八八四年八月法國海軍擊毀二十三艘中國艦艇和十五分鐘內摧毀福州造船廠，以及十年後日本艦隊在黃海海域擊敗中國艦隊，表明擁有現代科技並不足以使中國恢復到以前的強盛時代。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要經過兩個變革：第一，改變思維方式，摒棄儒家崇尚過去的思想，代之以着眼於未來發展的哲學思想；第二，改變社會和管理結構，從而提高效率和約束性。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洋務運動改革進一步增強。一八九五年由德國訓練的一批正規軍成立，在此基礎上成立了二十世紀初的新軍。一八九八年光緒皇帝和他的謀臣們頒佈了一百多條改革法律、金融和教育的新法。雖然慈禧太后掌握大權，將光緒皇帝軟禁在宮中，不過，改革運動仍在繼續。公立學校制度建立起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遠赴日本或西方繼續他們的教育。一九〇五年太后出人意料地取消了傳統的科舉制度，反對滿洲王朝的勢力逐漸壯大，尤其是那些接受過西方文化熏陶的人。

一八四二至一九一一年期間，可被視為中國放棄其長期閉關鎖國政策的時期，儘管很不情願，還是被捲進了全球政治和經濟體系之中。中國認識到了西方技術的先進性，尤其是在造船、武器、製造和通訊方面（蒸汽船、鐵路、電報、郵政服務）。與此同時，

[七] E.W.Edwards:《英國對華外交和財政，一八九五——一九一四年》，Clarendon出版社，牛津，一九八七年，第二章，第三〇—五二頁。

[八] S.Teng和J.K.Fairbanks編：《中國對西方的回應：文獻綜述，一八三九——一九二三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劍橋，一九五三年，第五三頁。